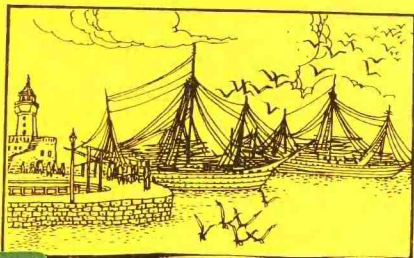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赴法勤工俭学



7
261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K261
3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赴法勤工俭学

周汉萍 余 波 编著

97
K261
3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赴法勤工俭学

周汉萍 余 波 编著

目 录

一、先声	(2)
二、开端	(7)
三、裂变	(13)
四、新生	(29)



C

367882

70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大厦林立的黄浦江边，一艘艘巨轮不时拉响汽笛。上午11时，日本邮船因幡九号又一次开始了赴欧的航程。旅客中，有89名年轻的中国学生，神情激动而又不安。他们是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在法国——共和主义的故乡，他们将当工人、勤工俭学，以掌握使中国获得独立、富强的技术和知识，回国后，他们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时年1919年3月17日。

首批学生经过55天的航行，于5月10日到达法国马赛港。此后数月都有百余名学生离开上海前往法国。到1920年末，约有1600名中国学生，在法国过着边学习边劳动的“勤工俭学”生活，形成了一支颇为壮观的留法勤工俭学队伍。周恩来、邓小平、刘伯坚、赵世炎、李维汉、傅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跻身其中，并成为中坚和先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意味着历来轻视体力劳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后代靠自己作工去挣得学费，而且说明了他们在积极地赞美劳动的神圣，学习外国，努力把知识和劳动结合起来，在血和汗的奋斗中，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

赴法勤工俭学是五四运动的产物。留法勤工俭学史是五四运动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构成部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国内革命斗争一起，构成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先声

1912年2月,伴随着辛亥革命成功的礼炮声,留法俭学会在巴黎成立。发起人是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张继、张人杰、褚民谊等。

蔡元培是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先生的最终理想,在于运用世界观和美感教育,实现超越政治的教育目的。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超越现象认识实体世界的存在,所谓美感教育就是实现实体教育的手段。教育的目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而对贫穷软弱的中国来说,就是富国强兵。蔡元培为此提出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当时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是指对外抗拒欧美列强的侵略,对内抑制军人的专横。实利主义教育是为了增强财力,巩固军事。为了避免以上两个方面教育中可能出现的弊端和危害,还必须加强第三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什么是公民道德呢?蔡元培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分别用中国的“义”、“恕”、“仁”来解释。富国强兵的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完全是法国式的道德。再加上他的公民道德主张,完全是以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教育为楷模的教育理论。遗憾的是,由于袁世凯叛变革命,仅仅任职7个月的蔡元培便辞职了。他的教育理想几乎没有付诸实现。

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在巴黎是无政府主义者,办有杂志

《新世纪》，并在经营工厂、商店的同时，创办“中华印字局”，印刷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另外，李煜瀛还开设“豆腐公司”，生产豆腐、腐乳等豆制品。工厂的工人都是他从河北故乡招募的。劳动之余，李煜瀛不仅教他们学习法语，还进行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育。武昌起义后，李煜瀛回到国内。

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社会中个人为本位。合诸个人而为村。合诸村而为国（非国家乃地方也）。会诸国而为社会。”因此，要改良社会首先要改进个人，完善个人的道德。旧中国腐败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沦丧，树立新道德是当务之急。因为，辛亥革命已经带来了政治上的成功，以后任务就是努力造就适合于新社会的具有新道德的人。

1912年2月，汪兆铭、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发起成立“进德会”，其宗旨是：“适应天下潮流、联络天下有志之士”，共同进行道德研究。进德会将反对卖淫、赌博、纳妾作为基本义务，还有其他更为严格的纪律。进德会是一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新生的共和国造就一个正统社会的道德改良运动。

李煜瀛等人对留法华工的教育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在法国培养人材的设想便提了出来。

1912年5月，留法俭学会正式开展活动。首先，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顺天高等学堂旧址，开办了预备学校。学校由巴黎豆腐公司经理、戏剧研究家齐如山主持。首期20多名学生，其中2名是女生。这些学生全部寄宿，自己承担伙食、卫生等工作，用刀叉吃西餐，学习法语、数学、国语等。课程为4个月。1912年8月，10多名来自四川的同学

成为第二期学员。

11月，第一、二期40多人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巴黎。12月20日，他们到达巴黎南面约600公里的蒙达尔。他们有的进了蒙达尔中学的预备学校，有的进了工业职业学校的预备学校。此后几年，为躲避战火，他们疏散到法国的其他地区。很多人进了大学，获得了学位。

在国内，留学俭学会继续招生。1913年6月，又将40余人送往巴黎。李煜瀛、齐如山看到工作进展顺利，不禁夸下海口：5年之内将3000学生送往法国。国内其他地方也仿效起来。吴玉章在四川组织了四川留法俭学会。上海以相同方式组织了留东（即日本）俭学会、留英俭学会。正当俭学会蓬勃发展之时，袁世凯公然实行反动政策，国民党的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日本。留法俭学会的命运随同二次革命而完结。李煜瀛、吴敬恒、蔡元培等人又亡命法国。方家胡同的预备学校也被关闭。

留法俭学会标榜的是为共和国而钻研学问。然而，二次革命的失败，揭示出那不过是一场梦。要救国，还必须寻找其他道路。

蔡元培、李煜瀛等人到达法国后，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很快临近巴黎。蔡元培在遥远的法国，忍痛听到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二十一条”等一连串令人愤慨的消息。他反复思索，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并决定对工人实行启蒙教育。李煜瀛等则在豆腐公司等处开展“以工兼学制度”、“勤工俭学会”。蔡元培

还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是专门对华工进行启蒙教育的组织。华法教育会则是为促进中法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而设立的机构。蔡元培认为,人类最普遍最悠久的事业是教育,为普及教育,必须制定共同的规范,但在当时,由于君主和教会两大障碍而不能形成共同的规范,甚至成为助长各民族对立的工具。只有法国教育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后,教育界已一洗君主专制和教会之遗毒,克服了君主和教会的危害。蔡元培认为法国是中国改革教育的楷模,而中国教育自孔子到黄宗羲的历史,也充满了民主政治精神,是容易学习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科学主义的。1916年6月,华法教育会正式成立。同年8月,该会发行《旅欧杂志》月刊,以向中国介绍欧洲事物为目的,特别着力于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和华工情况的报道。华法教育会发行的《旅欧教育运动》小册子,是赴法留学的必读书,是把法国的“科学真理”、“人道主义”输往中国的直接的途径。

1916年的法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极为缺乏,法国政府一方面欢迎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人来法,一方面通过军队从非洲、越南等殖民地征收劳动力。即使这样,劳动力仍然不足。因此,法国政府决定招收华工。

“惠民公司”是法国政府公使康梯与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磋商后成立的,专门招募赴法华工。“招工合同”上写明华法有安家费、旅费、工资等等权利,但大多成了一纸空文。“惠民公司”总部设在北京,还在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从1916年7月到1918年10月,“惠民公司”分批送到法国的华工总计约

3.5 万人。李煜瀛受法国政府的委托,从云南、广西直接招募 1200 多人,带往法国。还有一些国内的失业工人,从威海卫等地出发,前往法国。通过这一途径赴法的华工人数约有 10 万人,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华工约有 15 万人。

华工到达法国后,有些被编入军队,充当炮灰,更多的被派往各工厂,从事武器、火药、弹药、钢铁、造船、军需运输等工作。到 1919 年战争结束时为止,大约有 2 万名华工牺牲在异国他乡。15 万赴法华工,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明证。

华法教育会把对参战华工教育作为它的首要任务。1916 年 5 月华法教育会创办华工学校。蔡元培、李煜瀛等人担任教师。然而,能受到教育的华工仅仅局限于巴黎附近,人数极少。英国青年会曾派人到法国,与法国青年会一起,从事华工教育,影响超过了华法教育会。但华法教育会的《旅欧杂志》和其姊妹杂志《华工杂志》,运用注有拼音的白话文,既报道一次大战的状况和中国国内的动向,又反复教育华工通过“勤、俭、学”走向新的人生,作为“工界改良”的方法。随着华工的增加,杂志的发行量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华法教育会还在巴黎开办“翻译讲习班”,同时举办“函授科”,重新开展对华工的教育。1916 年末,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华法教育会其他成员也相继回国。从此,华法教育会开始把青年送往法国,造就勤工俭学的优秀人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式开始。

二、开端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改变国家命运的道路,历尽坎坷。他们曾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救中国。但事实证明,康梁的一套维新主张、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虽然使封建专制奴役下的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民主共和的希望转瞬即逝,中华民族仍然处于高压专断和愚昧之中。1915年,《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攻。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旧礼教、旧道德的禁锢,掀起了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成功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革命先驱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先进青年开始否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点,抛弃轻视劳动的观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青年学生投身革命的洪流,成为运动的急先锋。在斗争时,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即显现的巨大力量。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在国内的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实践,都纷纷失败。青年们再一次产生了远离祖国去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想法。新生的苏维埃是最为向往的,但难以实现,只有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才允许勤工俭学,半工半读,

再加上赴法勤工俭学会等组织的倡导,于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首先着手重建赴法俭学会。发起人除前文提到的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外,还有马景融、蔡分时、刘鼎生、白玉麟、罗伟章、吴玉章等人。他们仍然开办赴法俭学会预备学校,还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主要杂志上刊登招生广告。在1917年8月,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储库营的预备学校开学时,蔡元培、汪兆铭、吴玉章等人都登台演讲,宣传赴法留学的意义。最后发言的吴玉章,详细讲述了华法教育会提倡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包括四个方面:即扩展国民教育,输入世界文明,阐述儒家哲理,发展国民经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赴法留学与前一阶段相比,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意义,仍然处于对劳动者的启蒙阶段。

华法教育会努力把在法国产生的“勤工俭学”运动推广到全国。1917年秋,“保定各乡、村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开业。学校主要招募农村子弟,在短暂的1年“勤工俭学”活动中,对他们教授法语,并通过实习学习一些制造技术,准备到法国“以工求学”。华法教育会还打算建立“高级预备学校”,附设于其他中学或实业学校,学时2至3年,进行法语和工业知识的教育,以期取得和法国工业实习学校一样的效果。但这种“高级预备学校”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建立。

赴法勤工俭学不仅可以如蔡元培所希望的,弥补中国教育的不足,而且可以为中国民族工业培养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当时实业界人士普遍地支持勤工俭学运动。如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长王显华、浙江财阀钱永铭、中国实业银行的李雍等都同华法教育会有关系。大批青年能够赴法并得以生活，是与国内实业界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18年6月，湖南“新民学会”的代表蔡和森到北京了解赴法事宜。新民学会，1917年开始筹备，1918年4月正式成立。它是一个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改造中国”为宗旨的团体。他们专门开会讨论了赴法留学事宜。蔡和森来到华法教育会，却被以“人数有限”的借口拒之门外。蔡和森决心靠自己努力创建组织。毛泽东本人也怀着到北京接受新思想的愿望，1918年9月同其他20多人一起到达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与湖南一样，四川、广东、江西等全国各地的青年，为了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都赶到北京询问情况。毛泽东、蔡和森与华法教育会进行交涉，在蔡元培的帮助下，长辛店京汉铁路工厂开办了留法俭学班。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长沙、上海等地都成立了这样的预备班。到1919年3月，全国成立预备班的地方达到了20余处。进入预备班学习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便开始为赴法旅费和各项手续四处奔走。在国内为赴法勤工俭学开展的各项活动，培养了青年自主、独立的进取精神，也给青年提供了一个向工人学习的极好机会。1919年4月到5月，《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每周评论》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积极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样，当预备班结束时，青年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蔡和森到法国前后，已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

像蔡和森这样的人是极少见的，大多数勤工俭学生都像何长工那样，只有一些不太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

赴法的旅费，三等舱船票只需 400 元，但对于贫穷的学生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研究的几种打工途径都不能实施，最后还是由北京政府或各省政府出资补助。

李煜瀛曾经在招募华工的活动中捞取好处，此刻，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他以密切中法经济、增进两国教育关系为名，组织华法协进会，行募集捐款之实。1918 年 12 月 20 日，华法协进会在江西会馆举行 1000 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来宾有法国公使鲍宾(Boppe)、留法俭学会教师道鲁门、教育总长傅增湘、河工督办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代表、前交通部长叶恭绰的代表、前财政总长梁士诒、侨工局长张岱彬等。来宾、代表的发言都宣讲中法亲善的意义。蔡元培致了闭幕词并公布捐款名单：张岱彬 100 元，李长泰 1000 元，伍廷芳、汪精卫、吴玉章等 10000 法郎。除以上捐款外，李煜瀛还用各种关系，帮忙学生借款作旅费。在湖南，经李煜瀛的介绍，熊希龄以本利达 1000 余万两的米盐公款中，给了 40 位学生每人 400 元的借款。预备学校、旅费，一系列的困难都克服了，赴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917 年 3 月 17 日，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生 89 人从上海乘日本船启程；3 月 31 日，又有 26 人出发。这里包括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北京大学预备班等学校的学生，从籍贯上看，直隶和湖南的很多。华法教育会和留法俭学会还举办了欢送会。法国总领事及 3 个副领事、工部局的有关人员作为法国方面

的代表出席并致了欢送词。高鲁、洪诚、朱少屏等人代表中方讲话。他们对于法兰西文明同声称赞，举杯庆贺，还摄影留念。在码头上，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一些知名人士向学生们赠送了国旗徽章、书籍、杂志等等。当时上海的主要报纸《时报》对欢送会和送别仪式都作了详细报道，并称赞：赴法俭学的目的是“在海外发展我国工业势力”，反映了当时为发展工业急于进行技术教育的舆论动向。

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赴法工作暂时停止。在预备班学习的学生们，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活动中，青年们看到了自己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努力的新方向，可以说，经历了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青年们，获得了极大的政治觉醒，不再漠视“新思想”，而是十分明显地把法国当作他们寻求“救国新思想”的目标。

北京西南部的长辛店，是一个以京汉铁路车辆修理而发达的镇子，是当时北京唯一的近代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五四”运动前几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曾来到长辛店与长辛店赴法预备学校的学生一起，在工人中宣讲北京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无法废除二十一条，准备在屈辱的条法上签字。5月4日，长辛店的学生们骑着毛驴来到天安门，与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0余所学校的学生一起，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示威游行。他们举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小旗子，在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地焚烧了曹宅。这一天，有30多人被捕。预备班的学生回到长辛店后，立即到工厂、车站向工人们宣讲，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对政府签署卖国和约。6月3日，长辛

店工人,上海、天津的工人奋起响应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感到单凭武力不能压服人民,遂于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28日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的签字。至此,“五四”运动以军阀政府的妥协,学生、工人的胜利而结束。“五四”运动使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到1年,长辛店预备班结束。当他们离开长辛店时,他们每个人都更加明确了赴法留学的目的。

北京大学预备班、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以及其他预备班的学生,虽没有像长辛店预备班的学生那样,与工人群众关系如此密切,但经过“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洗礼,他们也突破了一般性的“劳工神圣”的认识,开始真正地感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这一时期,国内其他组织,如工读互助组织的王光祈、少年中国会的赵世炎、觉悟社的周恩来、在四川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聂荣臻、邓小平、陈毅,都陆续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另外,“五四”运动也使中国妇女的解放获得一个契机。1919年12月,湖南的向警予、蔡畅等人在长沙周南女校组织了湖南女子留学勤工俭学会,实现“男女教育必须平等”、“和男学生一样留学”的愿望。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干事4人,设有干事部和评议部,会所分别设立在周南女校和巴黎豆腐公司。以湖南为开端,浙江、江苏等地先进的女性也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的赴法留法运动,除湖南和四川进展最快外,广东、广西、河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青年也

纷纷报名出国。华法教育会已经无力承担更多的具体工作，因此，开始充实加强作为赴法口岸的上海分会和广东分会，专门为赴法学生提供住宿、学习经费等便利条件。同时还与黄炎培设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创立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通过在附属工厂实习的独特教育方法努力培养技术人材。随着华法教育会机关建设的加强，留学生出国的速度也加快了。每月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到华法教育会 1921 年发出停止出国的命令截止，共计约 17 批、1600 多名学生前往法国。

三、裂变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以中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学校学生、教师、工人、商人、记者等等。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 54 岁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毅然离开了故乡，与儿子、女儿（蔡畅）一起举家赴法，去受中等女子教育。其次是 43 岁的徐特立，他是湖南省著名的教育界领袖，也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到法国去做工。贵州省教育界知名人士，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也是如此。这些老前辈的壮举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王树棠，只有 10 岁。15 岁以下的还有 20 人左右。在勤工俭学中还有一批女生，约 20 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涌现出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毅、王若飞、李富春、陈延年、陈乔年、郭隆真、钟汝梅、刘清扬、邓小平、聂

荣臻、何长工、李维汉、蔡畅、萧三等等。他们有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了，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们在留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并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而是埋头读书，成了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者企业家等等，在旧中国，他们的报国之志向无法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但也还有后来或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消极颓废皈依天主的，他们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的渣滓，被时代、被历史所淘汰。

勤工俭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半工半读”，即白天学习，晚上做工。第二种“先工后读”，先工作3至6个月，积攒一定数量的钱后再专心读书。第三种“先读后工”，先用带来的钱读书，用完后再做工。也有的从一开始就去当工人，一心在工厂学习技术，也有的工读学生并非每天同时进行学习和劳动，而是利用春季或夏季休息的时间集中做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带钱的多少。得到省里补助金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从1919年到1920年上半年来法的学生，资金较充裕，先读后工的多。1920年下半年，先工后读、半工半读的人是多数。

总部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在李煜瀛、萧瑜（子升）的安排下，特设“学生事务部”，用专人处理日常工作，帮助勤工俭学的学生寻找适当的学校学习，或寻找适当的职业做工，以及负责发放各省补助金、借贷和追回华法教育会单独发放的奖学金等烦杂事务。赴法华人还出资买房，建立“华侨协社”。这